

法國大革命中的謠言現象 及其政治功能

● 高 毅

謠言如潮，是法國大革命有別於其他國家革命的一個獨特的政治文化現象。比如，攻打巴斯底獄之前曾有過關於貴族軍隊要驅散議會、血洗巴黎的傳聞，「大恐慌」時期盛傳過關於盜匪橫行、貴族陰謀和外國軍隊入侵的消息，「9月屠殺」前夕人們風傳「盜獄陰謀」和外國間諜要趁男人上前線之機在巴黎殺害婦女兒童，審判國王期間有過關於神秘的「短劍將士」在為營救國王而活動的謠傳，每次軍事失利總會激生大量有關特務搗鬼和將軍叛變的街談巷議，一遇糧食危機則少不了要流行許多關於有人在囤糧毀糧企圖餓死人民的說法，而在統制經濟期間，則始終流傳着指券^①要貶值或作廢的風言風語。此外，各種為進行政治迫害而散佈的人身誹謗更是多得不可勝數：甚麼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與王子亂倫，甚麼丹東要作攝政王、埃貝爾圖謀王政復辟，甚麼羅伯斯庇爾要娶公主為妻以便僭取王位，……事實上，在法國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人們處處都可以看到謠言這個

在法國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人們處處都可以看到謠言這個要素留下的顯著痕迹。

要素留下的顯著痕迹。誠如日內瓦大學教授B·巴茨柯所言：「謠言總是和大革命相伴行進。謠言在革命進程中振奮着精神，積聚着怒火，引導着恐懼。」^②正是在形形色色的謠言煽動刺激下，革命時代的法國民眾經常性地處於亢奮狀態，極易作出各種非理性的狂暴舉動，才使法國大革命呈現出其特有的激進外觀。

大革命謠言現象的心態根源

謠言本是極普通的社會心理現象，只要有人羣存在就可能發生謠言。但謠言的蜂起，一般說來至少得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天下行將大亂或已經大亂。置此之際，人們驚惶萬狀，忐忑不安，往往易於以訛傳訛地解釋變亂之動因，敘述事態之情狀，或揣測未來之命運。其二，社會缺乏高效大眾傳播媒體，或雖有各種媒體存在，但它由於種種原因並不能得到公眾信賴，人們主要地還是靠交談來



圖 謠言總是和大革命相伴行進，謠言在革命進程中振奮着精神，積聚着怒火，引導着恐怖。

傳遞「小道消息」，消息的訛傳於是在所難免。

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正充分具備這兩個條件。然而僅以此為據，似乎還不足以解釋法國革命謠言現象的特殊性。人們有理由質疑：革命時代的英國與美國也並非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可它們的謠言現象為甚麼就遠不如在法國革命中那樣突出？

這就需要談到革命時代法國人的政治心態特點。我們知道，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是近代世界上最豪邁的一羣革命者。他們的目標是同舊世界的一切「徹底決裂」，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就是要在法國的「過去與未來之

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③，實現法蘭西民族的全面新生。但是，在滿懷激情地說完這些豪言壯語之後，他們很快也就清楚地發現：真要達到這一目標，談何容易！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國內外敵對分子的拼死抵抗，革命陣營內部層出不窮的分化與叛變，在他們前進的道路上佈滿了荆棘和陷阱，也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激發起一種異乎尋常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感最顯見表現之一，便是法國革命者對於各種反革命陰謀的無法擺脫的憂慮，而這種強烈的「陰謀憂慮」，是人們在革命時代的英國或北美殖民地所感覺不到的。我們在法國革命者的

「陰謀憂慮」猶如一根紅線，貫串了法國革命者的全部言論。大革命時代洶湧的謠言大潮，也正是以關於各種「陰謀」的傳聞為基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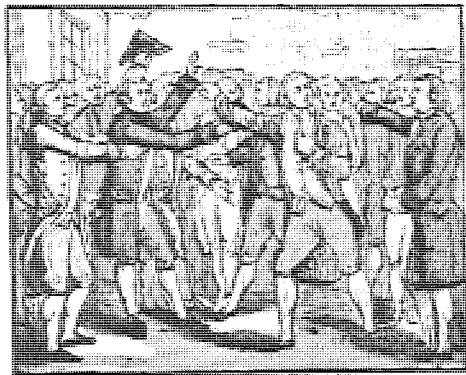


圖 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是近代世界上最豪邁的一羣革命者，他們的目標是同舊世界的一切「徹底決裂」，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就是要在法國的「過去與未來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實現法蘭西民族的全面新生。

言論中，隨處可以看到這種「陰謀憂慮」的印記。例如，迫於暗藏敵人的威脅，人們最偏愛的話題之一便是「揭穿假面具」，它每天都活躍在馬拉、埃貝爾等激進報人的筆端。早在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人專門創辦了一份叫做《國民揭發者》的報紙。到1793年，幾乎每個革命者在發表演說時，都要侃上一遍關於警惕「陰謀」的套話。在歷史學家F.孚雷看來，這種「陰謀憂慮」猶如一根紅線，貫串了法國革命者的全部言論④。大革命時代洶湧的謠言大潮，也正是以關於各種「陰謀」的傳聞為基礎的。

除了對各種反革命陰謀的極端憂慮和警惕之外，法蘭西民族大眾文化中一種相當獨特的恐懼「陰謀」的傳統心態，也是法國革命謠言現象的一個重要根源。這種文化心態中古老的「陰謀憂慮」涉及的主要是生計問題。舊制度法國有着典型形態的小農自然經濟，土地析分嚴重，生產力水平極低，勞苦大眾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困苦的生活使下層人民極端嫉恨驕奢淫逸的富有者，糧食的匱乏往往被歸咎於富人蓄意破壞，大眾中長年流行着貴族或奸商窖藏糧食、製造饑荒以便投機牟利的傳說，而這些傳聞在形勢嚴峻時又往往能激起民眾自發的羣體暴力行爲，導致連綿不斷的羣眾攻擊想像中的投機商、搶奪麵粉和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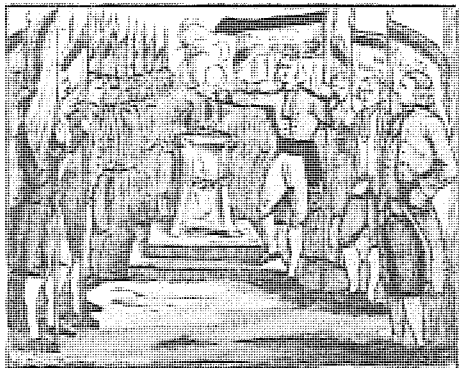


行限價等等事件。及至舊制度末年，法國統治集團內訌激烈，王室政府與高等法院相互攻訐，政治危機日趨嚴重，百姓對糧食投機的疑慮也開始同政治掛鉤。十八世紀60年代，政府在糧食問題上措施紊亂，時而自由放任，時而國家干預，高等法院借此大造輿論，攻擊國王及內閣權臣們蓄意製造糧食危機，魚肉百姓；政府方面也開動宣傳機器，稱高等法院是糧食危機的真正元兇。這場轟動一時的宣傳戰，越發加重了民眾對糧食「陰謀」的擔心，並開始促使人們把疑慮的目光投向國家機關，人們對政治事務的關注也由此與日俱增⑤。

人民大眾這種日益帶有政治色彩的「陰謀憂慮」，在大革命初期動盪不安的局勢下，極易於同第三等級革命精英們關於「貴族陰謀」的流行說法產生共鳴。應該說，革命時代法國所特有的那種對反革命陰謀的強烈憂慮感，正是大眾與精英的兩種「陰謀憂慮」相互衝撞與融合的產物，法國革命的謠言現象即由此濫觴。

謠言與羣體暴力的互動

強烈的「陰謀憂慮」使人們成天提心吊膽，也促成了人們想像力的超常發揮，各種謠言於是不脛而走。而謠



言的廣為流傳，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後果，又反過來加重着人們對「陰謀」的恐懼。

這就意味着，在革命時代的法國，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能在瞬息間引起一場巨大的社會恐慌。關於這一點，人們可以在 G. 勒費弗爾的史學名著《1789年的大恐慌》（1932年）中，看到許許多多生動的例證。事實表明，當時的法國民眾已如驚弓之鳥，不僅極容易聽信謠言，而且極善於在傳謠過程中把謠言變得越來越離奇。恰如米拉波在當時的《普羅旺斯郵報》（第21期）上所證實的那樣^①：

在這危難時刻，篤信和誇大凶險新聞成爲一種普遍習性。沒有甚麼比這更使觀察家感到震驚。彷彿邏輯本身已不在於計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於把最不着邊際的傳言當作事實。於是，這些傳言便編造出行兇事件，以陰暗的恐怖刺激人們的想像。我們宛如一羣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認真去聽……

革命初期最爲盛行的傳聞，是關於「貴族陰謀」的各種說法。人們對從梵爾賽傳出的種種並無確切證據的消息，如貴族在製造饑荒，企圖把一部分法國人餓死並唆使另一部分反對國

王；如貴族在調動軍隊並在招募匪徒準備鎮壓巴黎民運等等，均深信不移。如潮的謠傳，或者說各種被嚴重誇大的貴族陰謀，在引起人們強烈驚恐之餘，也很自然地激發起人們強烈的抗爭情緒，這就是勒費弗爾十分重視的「自衛本能」和「懲戒決心」，從而使羣體暴力成爲法國革命中一個極引人注目的關鍵因素。

1789年7月初，人們對大批貴族軍隊在巴黎市郊的集結疑慮重重。儘管政府方面解釋說，軍隊的開近是爲了防止騷亂，決非爲了鎮壓人民，但人們根本不信。隨着危險的加劇，巴黎人民開始表現出自衛本能——組建了一支自己的軍隊。7月11日，內克被解職，「貴族陰謀」更加具象化，示威羣眾開始走上街頭，並與王家軍隊發生衝突。謠言紛傳，說是王家軍隊將從蒙烏特爾高地和巴斯底獄炮轟巴黎，郊外的盜匪也將進城劫掠。頃刻間，巴黎羣情激憤，警鐘長鳴，街壘高築，戰旗飛揚，人們自發地武裝起來，直至最終演成攻打巴斯底獄的壯舉。一場劃時代的歷史活劇，就這樣由一次亂哄哄的羣體暴力行爲拉開了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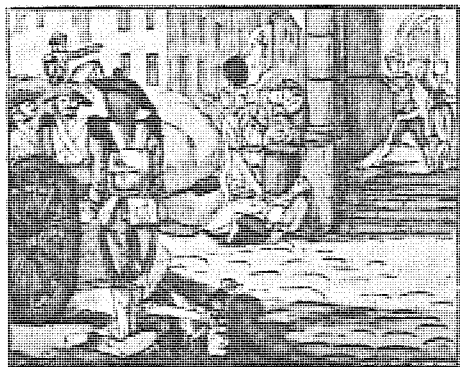
由「貴族陰謀」的傳聞激起的民眾抗爭情緒往往極端強烈，以致於透出一種令人生畏的仇殺衝動。7月15日，巴黎的一位商人在信中揚言「要

如潮的謠傳，在引起人們強烈驚恐之餘，也很自然地激發起人們強烈的抗爭情緒，從而使羣體暴力成爲法國革命中一個極引人注目的關鍵因素。



取20顆（貴族的）腦袋」。事實上在「7.14」事件之後的幾天裏，巴黎的暴民也的確自行處死了一批「貴族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有巴斯底獄守軍司令德洛內，巴黎商會會長弗萊塞爾，巴黎總督貝蒂埃及其岳丈——財政總監富隆等等。暴民們甚至殘忍地割下他們的首級，高高地挑在長矛尖上游行示眾。即使是一些平日裏溫文爾雅、審慎持重的資產階級精英人物，在這時也顯得異乎尋常地殺氣騰騰。如國民議會三巨頭之一的巴納夫，曾這樣公然為羣眾處死富隆和貝蒂埃等人的行為辯護：「難道他們的血就那麼純潔麼？」未來吉倫特派的靈魂、著名革命家羅蘭夫人，也在致議員博斯克的信中聲稱：「倘若國民議會不送兩個臭名昭著的傢伙上法庭，倘若我們愛國的德希烏斯們不想法砍掉兩顆腦袋，那你們就全都瘋了。」^⑦看來在當時的法國，無論是胼手胝足的勞苦大眾，還是滿腹經綸的知識階層，幾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種近乎狂亂的精神狀態，都認定只有訴諸羣體暴力，訴諸最極端的肉體消滅，才能有效地粉碎一切「貴族陰謀」。

這種誇張的抗爭情緒，很大程度上源自關於「貴族陰謀」的誇張的謠傳，而由這種抗爭情緒所激發的羣體暴力行為，無疑又會加強社會的緊張



氣氛，從而加強人們的危機意識，其結果，自然又為新的、更富有想像力的、更誇張的謠言的產生和流傳準備了土壤和條件。循環，似乎永遠也沒個頭。更何況在後來的革命過程中，也的確有實際的「貴族陰謀」在層出不窮，人們對「貴族陰謀」的恐懼還將隨着對外戰爭的爆發，隨着國內各種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發生，隨着內憂外患形勢的日益嚴峻，而持續地得到強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謠言的產生都將不足為奇，而謠言在人們心中所煽起的抗爭情緒，或者說自衛本能和懲戒決心，也將更具強烈、更具偏激，由此導致的羣體暴力則更加駭人聽聞，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1792年的「9月屠殺」。而1793年的恐怖統治，實質上不過是無政府狀態的羣體暴力的組織化、程序化而已。

謠言的功能

1789年謠言如潮、動亂迭起的事態震動了整個政界，也引起了人們新的疑慮。謠言在保守勢力方面被認為是出於革命黨人居心叵測的捏造；而在革命派方面，則很自然地被看成了「貴族陰謀」的一部分。如米拉波在第21期《普羅旺斯郵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就懷疑關於匪患的種種謠言的

當時的法國，無論是勞苦大眾，還是知識階層，都認定只有訴諸羣體暴力，訴諸最極端的肉體消滅，才能有效地粉碎一切「貴族陰謀」。



傳播是「自由的敵人」所為，並呼籲人們保持鎮定與謹慎。另一位議員納皮阿斯·皮蓋也說，農村中的匪患恐懼是一些「煽動鬧事的破壞分子」故意製造的，他們「一天到晚專門散佈謠言，憑空捏造內戰」。（9月17日在香港的講演）看來，很可能早在大革命時代的初期，法國革命者就從謠言所煽起或加强的普遍恐慌與激動的氣氛中，感受到了它內含的某種不容忽視的特殊政治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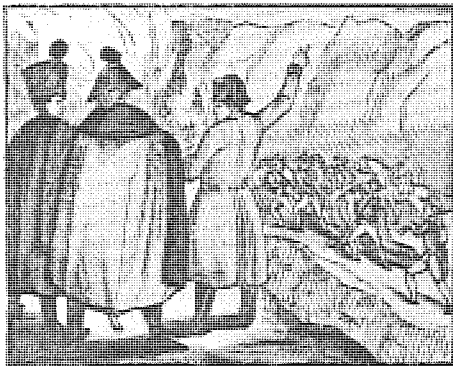
也很可能，從大革命一開始，人們就在有意識地利用謠言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無論在保守勢力方面，還是在革命陣營方面。例如，關於巴黎市內及市郊有盜匪出沒的謠言，就既被國王用來作為他往首都調動軍隊的理由，又成了革命資產階級建立民兵隊伍的藉口，而所謂的「盜匪」，主要地不過是在巴黎一帶流浪的失業工人。

發生在1792年9月初的巴黎大屠殺，可以說是革命派利用貴族陰謀的謠傳動員民眾拯救革命的又一突出的例證。革命的法國在當時的確面臨着空前危急的形勢：入侵的外敵節節進逼，攻陷了被稱作「法蘭西鐵門」的隆維，包圍了通向巴黎的門戶——凡爾登要塞；同時西部的旺地地區也傳來了即將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的情報。嚴重的內憂外患在首都引起了普遍的

激動情緒，數以千計的嫌疑犯被抓進了監獄，一支支市民義勇軍營隊火速組織起來準備開赴前線。正在這時，由於人們對國內叛賣活動的強烈擔憂，一個聳人聽聞的謠言又在不脛而走，說是在義勇軍離開巴黎後，關押在各監獄的嫌疑犯將發動暴亂，殺戮義勇軍戰士的妻子兒女，做入侵敵軍的內應。消息傳開，舉城嘩然。一種既恐慌又憤激的氣氛迅速充滿巴黎的大街小巷。

其實，據歷史學家的分析，當時犯人們即使在翹盼着普魯士軍隊的到來，也並不想冒險舉行暴動^②。不過對當時的巴黎百姓來說，這個謠言卻相當可信，因為各監獄的看守不僅人數少，而且素質差，常常發生犯人越獄逃跑和搗亂反抗的事件，況且當局本身也曾公開表示過擔心，怕刑事犯會成羣結隊地在城內流竄作案。於是，震驚之餘，人們發出了雄獅般的怒吼：到監獄去！不能帶着後顧之憂上前線，不能在去前方打仗的同時還擔心叛徒和陰謀家在後方屠殺自己的妻小！他們要在上前線之前對這些後方的隱患作一次先發制人的攻擊。一場觸目驚心的監獄屠殺就這樣開始了：從9月2日下午直到9月6日，巴黎屠殺延續了頭尾五天，其間巴黎各監獄在押犯人的半數共一千多人死於非命，其中頑固派教士和其他政治犯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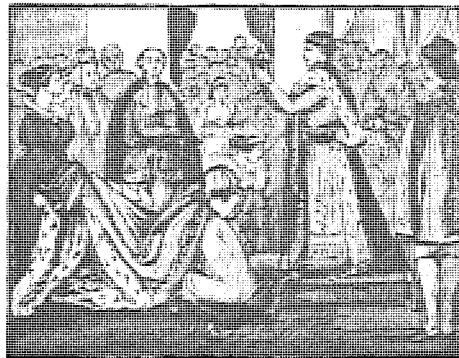
很可能，從大革命一開始，人們就在有意識地利用謠言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佔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均為普通刑事犯。

在這一事態的發展進程中，當時的革命領袖們又是怎樣動作的呢？政治傾向最激進的馬拉顯然曾利用謠言對屠殺進行過公開的煽動。他不僅親自告誡義勇軍戰士們在未審判在押人民之敵以前不要離開首都，而且還企圖把這種屠殺行為推廣到全國去；在他的參與下，巴黎市府監視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告外省愛國者書，號召他們前來保衛巴黎，並在出發前把當地的反革命分子斬盡殺絕。丹東雖然不曾這樣明目張膽地利用謠言鼓動殺人，但是，身為司法部長又是「8.10」起義後臨時政府實際首腦的他，卻不但沒有想辦法闢謠安民和制止屠殺，反而對這種「人民私刑」採取了奇怪的縱容、支持的態度。據認為他可能早就知道會發生屠殺，因為下達屠殺令的市府監視委員會裏有他的好幾個密友，而且在屠殺前一天，他還同這幾位好友幾乎同時採取行動，試圖把在押的一些熟人、朋友從監獄裏弄出來。可是儘管如此，他卻沒有打算採取任何防範、保衛措施。在9月3日那天，丹東甚至直接指使自己的朋友富尼埃屠殺了奧爾良監獄裏的一批囚犯。至於他這樣做的動機，他後來曾對沙特爾公爵（即後來法國7月王朝的國王路易·菲利普）說過這樣一段

丹東對「9月屠殺」的放縱，實際上是在不動聲色地利用着關於犯人暴動的謠傳來動員民眾，讓他們下決心破釜沉舟，與入侵的敵軍血戰到底。



話：「我當時是想讓所有去香檳地區（抗擊敵人）的巴黎青年身上都沾滿血迹，這樣我們才能相信他們的忠誠。我是想在他們和逃亡貴族之間開出一條血河。」^⑩由此可見，丹東對「9月屠殺」的放縱，實際上是在不動聲色地利用着關於犯人暴動的謠傳來動員民眾，讓他們下決心破釜沉舟，與入侵的敵軍血戰到底。瓦爾米戰役（1792年9月20日）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丹東這一策略的成功；那一天，在「民族萬歲」的口號下奮力頂住歐洲最驍勇善戰的普魯士軍隊的人們，正是這些在「9月屠殺」中雙手沾滿鮮血的巴黎無套褲漢。

然而如此屠殺畢竟是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於是在一年後的1793年9月，當形勢再次嚴重惡化的時候，我們看到丹東出於防止類似事件重演的動機，推動了雅各賓恐怖統治的建立。這種「恐怖統治」，無非是以有組織、有理性、講法律程序的官方暴力，來取代像「9月屠殺」那樣無組織、非理性、不講法律程序的羣眾暴力，它既可以滿足人民大眾對敵對分子的懲戒要求，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濫殺無辜。然而，我們也不應忘記，在當時把持政權的羅伯斯庇爾派心目中，這種恐怖統治不僅是「救國」的武器，而且也是實現「民族再生」的一種手段。由於整個法蘭



西民族可以簡單地劃分為「好公民」和「壞公民」（或「新人」和「舊人」）兩大部分，而那些「壞公民」或「舊人」懾於洶湧的革命潮流，往往又是以「戴小紅帽的假愛國者」的面目出現的，因而爲了實現整個民族的新生，革命派必須隨時注意識破和揭露這些暗藏的敵人，並堅決地把他們清洗出去。而且，能否對「壞公民」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能否善於並敢於揭發各種暗藏的敵人，在羅伯斯庇爾派看來也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公民責任感（也就是說是否是「好公民」）的重要標準之一。如此強調「清洗」的必要性和「檢舉」的重要性難免會引起「告密風」的盛行。而「告密風」又總是一發而不可收的；它使人人自危，進而又迫使人人都以「告密」來自保或施行報復，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假情報滿天飛、嫌疑犯遍地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到在種種舊式謠言的側畔，又不可遏止地興起了一種新型的謠言——這就是以革命政府的「官員」爲情報來源、以各種官方渠道爲傳播途徑、以無中生有或歪曲事實的人身誹謗爲基本內容、以對異己分子肉體消滅爲最終目的的「恐怖式謠言」。

這種謠言現象的出現，無疑反映着革命者對於謠言政治功能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如果說以往他們只是被動

地利用社會上業已流傳的謠言來爲自己服務的話，那麼，現在他們就已經在主動地製造並散佈謠言來推動自己的事業了。既然謠言能夠如此有力地刺激人們的情感，須臾不能離開人民大眾支持的革命精英們自然應該以更積極的姿態去運用它，應該讓它成爲他們純化民族、排除異己、掃清絆腳石的銳利武器！

運用謠言剪除異己

革命政府的實際領導人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等人看來就是運用「恐怖式謠言」的一些高手。爲了搞掉吉倫特派，羅伯斯庇爾早在1791年年底和1792年年初關於戰爭問題的爭論中，就開始含蓄地給人們一種吉倫特派同宮廷勾結的印象；在1792年「9月屠殺」即將開始之際，他又放出空氣，說吉倫特派著名領袖布里索是敵人的同黨，這話差點兒使他成了「人民私刑」的犧牲品，只是由於丹東的干預才幸免於難。後來恐怖時期革命法庭在處死21名吉倫特黨人時（1793年10月31日），給他們定的主要罪名又是所謂在各省組織「聯邦主義」叛亂，外省各城市的一些吉倫特派領袖也因此被處決。而「聯邦主義」這一罪名本身就是一種誹謗。吉倫特派大都

革命者對於謠言政治功能認識進一步深化，主動地製造並散佈謠言來推動自己的事業，使它成爲純化民族、排除異己、掃清絆腳石的銳利武器！

是忠實的共和主義者，儘管他們迫於巴黎激進派的壓迫而參與了各地的叛亂，但他們並不願意與王黨貴族反革命勢力為伍，並不贊成那種分裂共和國的地方自治，不贊成實行美國式的聯邦制。據知只有比佐和巴巴盧兩人鼓吹過「政治地區化」主張，希望部分地恢復各省失去的權力^⑩。勒費弗爾也曾這樣指出：「一些真誠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樣反對極端民主派，他們參加了地方自治運動，但在其中只佔少數。地方自治運動的主力是仍然擁護君主制的資產者、頑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舊制度的擁護者，他們全都自稱是吉倫特派，但這只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⑪因此，通過扣上「聯邦派」的帽子把吉倫特派定為「反革命」，並把他們送上斷頭台，實際上就是一種運用「恐怖式謠言」剪除異己的做法。

同樣，在鏟除忿激派、埃貝爾派和丹東派的過程中，羅伯斯庇爾派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運用過「恐怖式謠言」的武器。我們知道，忿激派的著名領袖雅克·盧曾被羅伯斯庇爾誣為「奧地利人的間諜」，後來又在種種最駭人聽聞和毫無根據的罪名下被投入監獄，終至含憤自殺；為了使鎮壓埃貝爾派的行動不致於激怒無套褲漢，羅伯斯庇爾巧妙地利用人們當時對「外國陰謀」的擔憂，把被認為是「外國間諜」的普魯里、克洛茲、佩雷拉等人列入埃貝爾、龍森、樊尚和莫莫羅集團，製造假象，以證明埃貝爾派「勾結外國、圖謀不軌」；對丹東派的清洗更突出地反映了羅伯斯庇爾以「恐怖式謠言」殺人的慣伎；他幫助聖茹斯特起草的公訴狀公然誣告丹東及其朋友參與了旨在推翻共和國的陰謀，並在國民公會上把丹東說成一個

「早已腐化了的偶像」，迫使那些不相信丹東會叛變、企圖為他辯護的議員噤若寒蟬；為了從道德上和政治上搞臭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還有意地把因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而被起訴的法布爾、沙博、巴齊爾、德洛內等人，著名的投機倒把分子愛斯帕涅教士、有歷史污點的威斯台爾曼和據認為道德敗壞、玩忽職守的埃羅·德·塞舍爾等人，以及被控參與了「外國陰謀集團」的古茲曼和弗雷兄弟，和只因鼓吹「寬容主義」而被捕的丹東及卡米耶·德穆蘭等人混在一起宣判，並特意製造出有人陰謀劫獄的謠言，以此為借口阻止丹東進行申辯，終於順利地砍下了他的腦袋。緊接着，羅伯斯庇爾派又利用「劫獄陰謀」的謠言來清洗反對派的殘餘分子，一舉處死了著名埃貝爾派分子肖梅特和埃貝爾及德穆蘭的遺孀等人。

羅伯斯庇爾和他的戰友們並非嗜血成性的陰謀家，他們剪除各派異己勢力或許也並非出於個人野心或派別的私利。作為盧梭的忠實信徒，作為既有堅定的革命理想又不乏某種現實主義精神的革命者，他們深信要保證革命的勝利必須同時反對溫和派和過激派。在共和三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關於革命政府的原則》的報告中，羅伯斯庇爾曾指出：「革命政府必須在兩塊暗礁——軟弱和魯莽，亦即溫和主義和過激主義——之間航行。因為溫和主義並不是穩健，就像陽萎並不是貞潔，而過激主義貌似剛毅，也猶如水腫貌似健壯。」^⑫既然鏟除亂黨是革命的需要，那麼無論用甚麼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都將只是個技術問題，因而都不可以根據道德的理由來加以指責。即使是造謠惑眾、惡意中傷、肆意誹謗，只要能

既然鏟除亂黨是革命的需要，那麼無論用甚麼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都將只是個技術問題，因而都不可以根據道德的理由來加以指責。

效地、迅速地打倒亂黨，都應當毫不猶豫地採用，無須考慮其道德上的正當不正當。

另一方面，「恐怖式謠言」之所以能夠成為羅伯斯庇爾派清洗異己勢力的重要手段，還因為這種謠言在恐怖時期的特定條件下，特別易於征服人心，能夠迅速地使受控者毀譽、從而喪失輿論支持的緣故。反對羅伯斯庇爾派的各「亂黨」的頭目一般都曾在革命中作出過貢獻，是深得眾望、聲名顯赫的革命家，然而他們的光榮和聲望在「恐怖式謠言」面前卻顯得極其脆弱，簡直不堪一擊，這究竟是為甚麼？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恐怖統治培育了一種過度激動而失常的社會想像力，一種「恐怖之下無怪事」的倦怠心理，以致於人們已習慣於對一切傳聞，哪怕是最荒誕不經的傳聞，都見怪不怪地貿然接受，懶得去作認真推考。誠如巴茨柯所指出的^⑬：

在恐怖時期，由於連續不斷的清洗運動，由於告密被譽為公民美德，由於愈來愈多的人受到指控，一個又一個新陰謀被大白於天下，人們的情緒激動到了極點。在這種氣氛下，是不存在甚麼不可懷疑的人的。那些昨日的英雄不是一樣被揭去了面紗、露出了革命敵人的真面目了嗎？他們熱情不過是一層偽裝，在偽裝的背後隱藏最險惡的打算，隱藏着貴族與王黨的陰謀。……對於這種想像力來說，難道還有甚麼不可接受的東西嗎？

謠言的反動

顯然，這裏發生的是這樣一個辯證的過程：是「恐怖式謠言」有力地強

化了人們的危機意識或對「陰謀」的恐懼心理，而對「陰謀」的超常的憂慮反過來又大大便利了「恐怖式謠言」生產、傳播和發揮政治作用。難怪羅伯斯庇爾造起謠來是那樣的肆無忌憚、信口開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是使用「恐怖式謠言」殺人的專家羅伯斯庇爾自己，後來也無可奈何地栽倒在這種謠言的淫威之下。據史料記載，在熱月9—10日的夜間，當巴黎市府把被捕的羅伯斯庇爾等人劫下來送到市政廳的時候，巴黎各區的大街小巷，特別是在聚集着準備起義的各區自衛軍的沙灘廣場上，就傳開了聳人聽聞的消息：羅伯斯庇爾是一個巧扮成革命者的王黨分子，他企圖營救路易十六之子並把他扶上王位；他已同路易十六之女秘密訂婚，企圖有朝一日僭取王位，並為此準備了一枚帶有百合花圖案（波旁王朝的標誌）的御璽。這個顯然是由政變當局有意識地散佈出去的謊言，立即產生了促使起義者軍心渙散的效果：集合在沙灘廣場上整裝待命的起義軍戰士們猶豫了，害怕了，終於在瓢潑的大雨下四散回家，以致於當國民公會的軍隊在凌晨一點鐘趕到市政廳時，廣場上空無一人！結果，巴黎市府未經戰鬥就被打垮，羅伯斯庇爾等人在萬眾唾罵之下被斫去了腦袋。

頭一天還權勢煥赫、萬民崇仰的「不可腐蝕者」，第二天就身敗名裂、橫死斷頭台，這一事實不僅再次說明了「恐怖式謠言」的厲害，而且還向一切希望結束恐怖統治的人們提供了一個「以恐怖制恐怖」的成功範例，這個範例將深刻地影響熱月時期反動派的行為方式。儘管在羅伯斯庇爾倒台之後，作為一個制度的恐怖統治行將

即使是使用「恐怖式謠言」殺人的專家羅伯斯庇爾自己，後來也無可奈何地栽倒在這種謠言的淫威之下。

壽終正寢，作為恐怖統治的產物的「恐怖式謠言」也將隨之成為歷史，然而「謠言」這一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特有的因素卻並沒有因此而消聲匿迹。在熱月時期，由於大革命的「危機意識」仍然存在，「陰謀」和「暗藏的敵人」之類仍然是掛在人們嘴上的熱門話題，因而各種各樣的政治謠言也仍然不絕如縷，如芽月起義前後的巴黎，社會上曾盛傳着恐怖分子要在默東建立人皮製造工場，有半數議員拒絕宣判比約·瓦萊納等四名雅各賓派恐怖主義者並企圖逃往夏龍地區等等謠言；在荷月暴動時期，又有雅各賓派「嗜血者」要屠殺老弱婦孺，國民公會將准許士兵在巴黎隨意搶掠二小時等等說法在沸沸揚揚。不同的只是，這時的造謠者已不再是激進民主派，而是形形色色的反動派、變節者、恐怖分子和「金色青年」團伙了。各種想像中的「陰謀家」則成了雅各賓派、無套褲漢活動分子和共和派人士。由此看來，伴隨着熱月時期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奔騰激盪的反動潮流，還出現了一個「謠言的反動」：曾經幫助建立並強化過雅各賓專政的「謠言」這一政治文化因素，這時已經蛻變為反動分子製造白色恐怖的武器。

曾經幫助建立並強化過雅各賓專政的「謠言」這一政治文化因素，這時已經蛻變為反動分子製造白色恐怖的武器。

註釋

- ① 大革命時代法國的紙幣。
 ②③ B. Bacsko, "Robespierre-roi ou comment sortir de la Terreur?" (in *Le Débat*, No. 39, 1986), p. 115, pp. 115-16.

② Cf. A.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1986), p. 43.

③ Cf. F.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1978), pp. 78-79.

④ Cf. L.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6), p. 40.

⑤⑥ 轉引自 A. Soboul,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2), p. 158, p. 344.

⑦ Cf. G.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J. White 英譯 (New York, 1973), p. 85. 德希烏斯 (Decius, 201-251), 羅馬帝國皇帝, 249-251年在位, 曾迫害基督教徒, 致力於維護羅馬帝國的統一。法國革命時代的革命派中盛行的古希臘羅馬的英雄人物自比的風氣, 這裏羅蘭夫人在以「德希烏斯」喻稱國民制憲議會的議員。

⑧ Cf. G.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66), p. 263.

⑨ Cf. N. Hampson, *Danton* (London, 1978), p. 82.

⑩ Cf. A. Forrest, *Federalism in C. Lucas,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 2 (Pergamon, 1986), pp. 309-327.

⑪ G.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352.

高毅 歷史學博士，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講師，著有〈丹東政治矛盾性再認識〉、〈熱月現象雜議〉、〈論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等十多篇論文和專著《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並主持或參與翻譯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內容》等多種譯著。